

沧桑文丛

主编 ■ 李辉

魂牵净土

刘尚淳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留下世纪的

影子和声音

提供真实的

纪录和思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魂牵净土/刘尚淳著. -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11
(沧桑文丛;第2批/李辉主编)
ISBN 7-215-04418-1

I.魂… II.刘… III.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6991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郑州文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8.625 字数 199 千字

1999 年 3 月第 1 版 199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 000 册

定价:16.00 元



刘尚淳，陕西省志丹县人，1950年11月生于北京。“文革”期间，父母受到冲击和迫害，1968年9月，他来到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武川县插队，1975年就读于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冶金系，曾先后从事过工业设计和管理工作。1994年正式开始写作，内容以纪实和历史体裁为主，曾在《华人文化世界》、《当代青年》等刊物上发表过文章。



“文革”期间，作者与妹妹刘索拉合影



童年时，作者与姐姐刘米拉的合影



作者与妹妹刘索拉、母亲李建彤合影（1994年）

“沧桑文丛”总序

每个人都生活于沧桑之中。

沧桑是时间的流动。昨天、今天、明天，在流动中构成一个整体。如同一条河流的水，尽管来自不同山川，一旦流在一起，便浑然一体，无法将之一一分开。

沧桑也是空间的存在。同一个时刻，同样的阳光照耀下，或者同一场风雨之中，每个人都不会重复同样的故事，而不同的故事不同的人，便使流动着的沧桑变得丰富起来。

对于每一个个人而言，在他的心灵世界里，沧桑便是时间与空间的结合。他在时间的流动中感受着历史，他在空间的存在中感受着世界，或者说，两者从来就是一体的。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与现实、个人与群体、抽象与具体的交叉渗透中，沧桑才赋予人的情感、思想、人生一种沉甸甸的分量。

大概还没有别的时候，比走近世纪末并跨入新世纪

门坎时更让人感到“沧桑”这个词的含义。似乎在这样的时刻,人们才更深切地感受到时间的流逝与人生、社会的变迁。不管他处在什么历史位置,不管他的过去是如何走过,回首往事,抚摸流逝的日子,都将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而对更多的读者来说,处在世纪转折时刻,历史的好奇心也将愈加强烈。他们知道,阅读他人的人生故事和昔日的历史场景,实际上已成为自己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

一个即将成为过去的世纪是如何走过,在这个世纪的舞台上人们是如何出演着生活的戏剧,将成为一个长久的话题,把今天和明天的读者深深吸引。

主编一套“沧桑文丛”的构想,便在这样一种感受中形成。

“沧桑文丛”将以回忆录和传记为主,并适当选择一些不同历史时期的日记、信件等能够真实反映历史原状的作品。作者或传主不受其名望、地位、职业的限制,题材不受其大小重轻的限制,风格也尽可能多样化。

不猎奇,不虚饰,历史的真实应该是“沧桑文丛”的灵魂与品格。

重要的当然在于,文丛中的作品,能够留下这个世纪的影子和声音,能够为下个世纪的人们,提供真实的历史记录。我相信,真正具有历史价值的作品,才会受到读者的青睐,才是“沧桑文丛”这种类型的丛书的生命力之所

在。

愿这样一套丛书，以它独有的姿态，伴随着读者走进新的世纪。

李 辉

1997 年 1 月 28 日

目 录

上 卷

- 第一章 平地风波 / 3
- 第二章 八方风雨 / 15
- 第三章 再遭磨难 / 25
- 第四章 身陷囹圄 / 36
- 第五章 天各一方 / 58
- 第六章 据理力争 / 72
- 第七章 不畏强御 / 98

下 卷

- 第一章 发配江西 / 121
- 第二章 干校生活 / 129
- 第三章 再次交锋 / 139

第四章	大难不死 / 144
第五章	同命相怜 / 150
第六章	风云万变 / 160
第七章	风雪迷漫 / 173
第八章	母女团聚 / 177
第九章	辗转返京 / 188
第十章	步步为营 / 193
第十一章	一线曙光 / 200
第十二章	恶梦初醒 / 212
第十三章	阴云密布 / 222
第十四章	人间正道 / 227
附 注	/ 237

上 卷

第一章 平地风波

1962年8月,避暑胜地北戴河,风平浪静,万里无云。极目远眺,万顷碧波直连天际,成群的海鸥在飞翔,远处,时时还能看到挂着白帆的点点渔舟点缀其间,天地茫茫,海空一色,使人不禁生出一种“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飘飘之感。

然而,就在这里,正在召开一年一度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这是为八届十中全会做准备的预备会。本来是要重点讨论在国民经济开始复苏的形势下,如何发展工业、农业、财贸及城市建设等一系列经济问题,目的在于使中国彻底从三年来的困境中挣脱出来。

可是谁也没想到,等到毛泽东8月6日在大会上讲话时,却突然语气严厉,措词尖锐地提出来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并在中心小组会议上反复强调:只要有阶级存在,就会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就会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就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而且,这种斗争要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几十年,几百年都存在。

毛泽东这些措词严厉的告诫,本来是针对他认为当时存在的“三种风”,即以刘少奇、周恩来、陈云为代表的“黑暗风”,以邓子恢、陈云为代表的“单干风”,以及以彭德怀为代表的“翻案风”而发的,但是却被老奸巨猾的康生所利用。他在会上对小说《刘志丹》公开发难,诬陷这部书的背后有一个由西北干部组成的“反党集团”,他们支持写《刘志丹》的目的,就是要给高岗翻案,为习仲勋树碑立传,并以此来达到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

康生在小组会上,还公开向习仲勋^①发难:“你是反党集团的挂帅人物。你们这个反党集团,不仅有刘景范^②,还有贾拓夫^③。上有头目,下有手脚,你们活动能量,可谓大矣!有在后台摇雕翎扇的,有在前台冲锋陷阵的。你们想翻天哩!”

1962年9月24日,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并且他反复强调,阶级斗争必需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康生抓住这个天赐良机,处心积虑地为《刘志丹》罗织罪名,制造冤案,恨不得将所有西北干部统统打入到一个反党集团中去,蛊惑得毛泽东说出了那段在以后17年中对于包括《刘志丹》书的作者李建彤^④在内的广大西北干部就像紧箍咒一般的语录:“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由于这是毛泽东亲自点名的“反党要案”,因此下面的有关部门处理时就抓得特别紧。10月中旬,康生领导的“中央专案委员

会”把李建彤叫到中央组织部，在二楼会议室里对她进行了第一次“三堂会审”。何谓“三堂”？原来三堂即是：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监察委员会。这三个直属党中央领导的权力部门组成了中央专案委员会，由康生亲自挂帅，担任主任，中央组织部主要负责人任秘书长。但是在“提审”她的那天，康生等几个巨头并没有出场，而是由中央组织部一名副部长、一名处长，中央宣传部的两名处长，以及中央监察委员会两名副主任等出面，看那阵容，也还算整齐、强大。

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一位副主任主持那天的审查会，她首先用冰冷的声音说道：“我们受党中央和康生同志的委托，来审查你写的那本反党小说《刘志丹》的问题，现在你先谈谈写作过程吧。”

由于“中央专案委员会”的审查人员是以党组织代表的身份来审查这个案子，所以李建彤虽然窝了一肚子的火，却也无可奈何，党在她的心目中是无比神圣的，自从她参加革命以来，就已决心将一切都献给党，可她现在却背上了一个“利用小说反党”的罪名，她明明歌颂的是革命领袖刘志丹，现在却成了“为高岗翻案”，可是又能到哪儿讲理去呢？“大帽子底下压死人”，她心里默默地想道。现在她更加深切地体会到刘志丹当年的处境与心情了。

没办法，她只好忍着气，耐着性子来回答他们的问题。于是她便从中宣部的烈士名单、工人出版社的选题计划以及向她组稿^⑤谈起，一直谈到她的采访和写作。等她谈完后，主持人又冷冷地说道：“你没有参加过土地革命，这书你能写得出来吗？还不是得要习仲勋、刘景范他们帮你写？”一听这话，她顿时明白了，这些人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们的目的是要将习仲勋、刘景范统统拉进此案，然后再将西北干部一网打尽。想到此处，她的火往上撞，

再也顾不得那许多的利害得失了,便和他们据理争辩起来。争到最后,那些人理屈词穷,实在抵挡不住了,便又送她一顶“态度极不老实”的帽子,草草结束了第一轮“三堂会审”,什么结论也没作出来。

“中央专案委员会”采用了各个击破的战术,同时也抓紧了对刘景范的审查工作。1962年10月23日下午,中央组织部主要负责人将他叫去谈了整整3个小时,以党组织的名义来压他,逼他承认《刘志丹》这本书是他与习仲勋合谋而作的,但被他顶了回去。

此后,中央又派人到家里和刘景范谈话,目的仍是逼他承认在西北高级干部中间确有一个“反党集团”,习仲勋是这个反党集团的后台老板,而小说《刘志丹》则是他们反党行动的舆论工具。在受到刘景范的严词驳斥后,隔了两天,中央组织部便组织召开了由部长主持的斗争会,对刘景范进行批判、斗争。会后,又从他们家中抄走了李建彤的大部分手稿和18本采访记录,并没收了刘景范作为纪念品而珍藏起来的内战时期的枪支^⑥。

没收高级干部的枪支,这种举动在当时可算得上是一个相当严重的信号,它表明你已失去了组织上的最后一点儿信任,同时也宣布了你的政治生命已基本上完结。当然,“组织”一词往往是某个人或某几个人的代名词,“组织”只不过是用来体现他或他们意志的工具。

康生对西北干部有着一种极端复杂的仇恨心理(当然对个别人除外),确切地说,这个梁子是在延安就已结下的。那时,他作为中共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1939年至1943年在延安搞的肃反扩大化和“抢救运动”以及在晋绥地区推行的极左的土改路线,都曾遭到西北干部的强烈抵制和反对,并且占了上风,因此导致他

一度失宠,受了毛泽东多年的冷遇。偷鸡不着蚀把米,还坐了七八年的冷板凳,这叫康生怎能不恨那些多管闲事、使他爬到半截就摔下来的西北干部?

康生是个报复心极强的人,遇到这样的天赐良机当然会全力以赴,上报知遇之恩,下雪当年之耻,更重要的是,他要踩着这些开国元勋的头颅,爬得更快更高,决不能再重蹈当年的覆辙。

他惟恐这次整不垮西北干部,再放虎归山他就彻底没戏了。所以,自从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他便怀抱着尚方宝剑进行督战,频频地作指示,授机宜,一定要把西北干部置之死地而后快,而对那些曾经为《刘志丹》的问世出过大力气的工人出版社的同仁们,也一样不肯放过,一定要斩尽杀绝方才甘心。

1962年10月5日,康生派人到工人出版社去内查外调,临行前,就曾作过这样的指示:“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揪出了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并揭露了他们炮制反党小说《刘志丹》的案件,中央曾指示《工人日报》重印300本《刘志丹》送给中央供批判用,可是却有人立即给小说的作者、反党分子李建彤通风报信,你们对此事一定要追查到底,工人出版社的有关部门要人人过关,决不能手软!”

有了这样的指示,工人出版社与此书有关的编辑们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据后来了解,他们当中有的人被撤职批判,有的人被下放劳改,还有些人甚至下落不明^⑦。

在第二轮的“三堂会审”时,他们又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即经费问题。他们认为,要想写一部书,尤其是这么大的一个题材,必需有相当大的一笔经费来支持,方能取得成功。既然这部书是习仲

勋、刘景范等人支持写的,那毫无疑问,一定是他们提供的经费了。

当然,按照当时中国的办事规律来分析,要想写刘志丹这样一位有胆有识、艰苦创业的传奇式人物,而且又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国最后一块红色根据地的最主要的创建者和领导者,国家最起码要抽调两三个专业写作人员,花上个三年五载,在全国内查外调一番,这当然需要不少的钱。可是世上偏偏就有那种不按照人为规律办事的人,这次还真让他们赶上了,李建彤就是这种人。

李建彤为了完成她多年来的夙愿,同时也不愿意给国家增加负担,因此两次去西安、陕南、关中、陕北等地采访时,根本没有花国家的一分钱,包括路费在内,全部是她自费,也就是说,她的写作经费全部来自她与家人的节衣缩食。

第二次“三堂会审”时,她如实地介绍了她的经费来源,可是那些审案的人说什么也不肯相信世上还有这种傻人会办这种傻事,一致认为她的态度仍然极不老实。这当然不能算完,“中央专案委员会”又抽调了大量的人力,四处去翻查账本,不但要查她和刘景范的机关,还去查了国务院的财务账,总想找到她的报销单据。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继续往下做文章。

就因为这笔经费的来源过于“神秘”,因此在追查期间,又株连了不少与此案无关的人,其中就有当时的国务院副秘书长高登榜。高登榜之所以卷入此案,就因为他是陕北人,又是国务院里分管财务的副秘书长,于是康生就来了个一石二鸟,顺手便将他与习仲勋拴在了一起。这样一来,不但习仲勋成了李建彤的后台老板,连高登榜也变成她的“财政部长”了。

按理说,刘志丹作为民族英雄和革命烈士,本是纳入党中央宣